



● 作者/Robert Kagan ● 譯者/李柏彥 ● 審者/洪琬婷

美國 責無旁貸 的領導角色

A Superpower, Like It or Not

取材/2021年3-4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2021)

美國必須摒棄過去安居
國土的守舊思維，積極
運用無可限量的權力維
持國際秩序，以避免競
爭對手誤判局勢，防止不
必要的軍事衝突爆發。

(Source: State Department/ Freddie Everett)





受歷史經驗、地理位置、文化、信仰和迷思影響，所有強權國家都有其根深蒂固的自我認知。當今許多中國人渴望回到他們蒙受「百年國恥」(the Century of Humiliation)之前，處於文明鼎盛、所向披靡的偉大時代。俄羅斯人則懷念過去位列兩大超級強權之一，統治領土從波蘭延伸至海參崴的蘇聯時期。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觀察指出，伊朗領導人必須在「國家或意識形態團體」(A nation or A cause)身分之間做出選擇，但其實所有野心勃勃的大國往往認為他們兩者皆是。如此自我認知形塑了國家利益，從而決定為了確保安全所採取的行動和所需資源。多數時候，正是這些自我認知驅使國家、帝國和城邦邁步向前，甚至有時也走向了毀滅。過去幾個世紀發生戲劇性轉變，往往導因於大國自身的野心大過於能力，而不堪負荷。

而美國的問題恰恰相反。身為全球大國，美國的能力超越了自認在世界所該扮演的角色和適當位置。即便他們曾面臨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

蘇聯共產主義，和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威脅，美國仍認為積極涉入全球事務非常態之舉。即便在網際網路、長程飛彈和全球經濟互賴時代，許多美國人仍有居於廣闊大陸，不會受到世界混亂局面波及的心態。美國人從來就不是孤立主義者。在急迫關頭，他們會願意為千里之遙的地方採取特別行動。但美國認為這是因應特殊情況的特例，也不認為自己是維護某種世界秩序的中堅力量；美國從未正視這個關鍵角色。

因此，美國常遜於扮演此一角色。安居廣闊大陸的心態使其國際行為在一個世紀內劇烈擺盪——先是漠不關心，接著驚慌失措的緊急動員介入，接著退卻而緊縮涉外行動。美國人將花費相對低的阿富汗及伊拉克軍事干涉行動比喻為「永無止境的戰爭」，清楚體現了即便是為確保整體和平和遏制威脅，還是無法容忍麻煩事永遠存在下去。在此兩大事件中，美國從一開始便想撒手離開，讓惡化之局勢更為失控。

美國這種躊躇不前的模式，

導致盟邦和對手心生疑慮亦產生誤判，甚至原本許多可望避免的衝突事件不斷發生，正是因為美國沒有持續施加其權力和影響力，去努力維持和平、穩定的自由世界秩序。20世紀時，諸多外國領導人和政府對美國產生誤判，導致他們相繼喪命和垮臺，包括德國(兩度)、日本、蘇聯、塞爾維亞和伊拉克皆是如此。在21世紀，如欲避免相同模式再次發生(其中最危險的便是與中共對抗)，美國人就必須接納他們命中註定應承擔的角色，運用與生俱來的力量挺身而出。或許經過川普總統四年任期，美國人已準備好坦誠面對。

想法分歧

美國人傾向扮演有所節制的國際角色，其實是受到他們的歷史經驗和迷思所影響。相對於其他強權渴望重回昔日榮耀，美國人總是心心念念回到國家開創之初，彼時不問世事、節制野心的時光。在這個共和國甫誕生的頭十年，美國人以弱小的共和國之姿費盡全力在君主強權世界裡求生存。他們



為因應特殊情況，美軍會採取特別行動遠赴境外部署。(Source: USN/ Nathan Wilkes)

在19世紀獨善其身、著重內部事務；征服美洲大陸、處理奴隸問題。到20世紀初期，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富足、最有潛力成為獨霸強權的國家，但他們卻不須承擔義務和責任。這個國家在良善世界秩序的庇蔭下茁壯，而不受外界干擾。1888年，英國歷史學家布萊斯(James Bryce)如此形容美國：「她不受外國攻擊、甚至不受恫嚇。她聽見遠方歐洲人因飽受戰爭而哀嚎，如同伊比鳩魯眾神(the Gods of Epicurus)聽見大地愁雲慘霧的喃喃自語，繚繞在其金屋腳下。」布萊斯寫道，「但

在此刻，她卻朝著艷陽、航向大海。」

但隨後，這個世界產生了變化，美國人突然發現他們位居中心位置。隨著新強權誕生，由英國樹立的舊秩序以及脆弱的歐洲和平景況開始崩解。德國崛起更摧毀了歐洲岌岌可危的均衡狀態，但歐洲人卻無法加以重建。日本和美國同時崛起，打破英國海軍超過一個世紀的霸權狀態。全球地緣政治取代了由歐洲主導的世界秩序，而在這個非常不同的權力結構中，美國被迫站在新的位置。環顧全球，只有美國能同時成為太平



洋和大西洋強權。由於北方和南方沒有強鄰威脅且東西方皆有大洋屏障，只有美國有能力在遠方戰場投射軍力達一段時間且本土安全無虞。只有其足以同時運用財力，支援自身和盟邦的戰爭行動，調動工業能力來生產船艦、戰機、戰車和其他武裝物資並同時供應他國軍火。只有美國，在每一場戰爭中可以避免走向破產，反而因此變得更加富裕、更具主導力量。如同英國政治家貝爾福(Arthur Balfour)觀察，美國已成為全世界圍繞的「樞紐」，或是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所言的「全世界權力的平衡者。」

世界上從未出現如此強權，過去亦沒有任何詞彙可以對此事加以形容和解釋。他形成自成一格的強權狀態。這個前所未見的強權崛起讓各界跌破眼鏡。各國曾花費幾世紀時間評估周邊區域的權力關係，但他們卻對美國這個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所帶來的影響後知後覺，也赫然發現這個原本對國際事務長期漠不關心的國家，已搖身一變成為權力平衡者。美國人自身亦經過心態調適的一番掙扎。雖其財富和相對無堅不摧的能力使之得以參戰，同時維持歐洲、亞洲和中東的和平狀態，但他們對此般作為的必要性、目的性和道德性有所存疑。美國基本上可以自我防衛同時自給自足，為什麼還要涉入遠在千里之外的戰爭衝突？又有何權利這麼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老羅斯福總統和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首次提出政策，希望建立和維護自由世界秩序。在英國和其他歐洲強權再也無力維持秩序下，他們依據戰爭局勢發展，認為美國必須創建並且捍衛新的世界秩序。這是

老羅斯福在戰爭初期主張「創立世界聯盟維護正義和平」的原因，亦是威爾遜主張成立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目的：旨在建立一套以美國權力為中心的新和平秩序。威爾遜認為，要讓歐洲從衝突災難後復原，這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方案。他提出警告，若美國人轉而採取「狹隘、自私且守舊的態度」，和平將會瓦解，歐洲也將再次分裂為「敵對陣營」，世界會再次陷入「極度黑暗」之中，美國亦會再次被捲入戰爭漩窩。對美國來說，最符合利益的是歐洲和平穩定且由民主政體主導、亞洲不受戰火肆虐，以及海洋自由開放讓美國貨品能夠安全進出。但只有美國運用其權力，這樣的世界才得以成形。因此全球秩序攸關美國利益。

但如此主張遭遇了強大反對聲浪。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其他評論家曾批評威爾遜成立國際聯盟為多此一舉，與美國開國元勳的理念背道而馳。對他們而言，美國應在全球陷入戰爭時展現自己是與眾不同、愛好和平的國家，而捨身捍衛世界秩序根本違反此項基本原則。20年後，當美國人辯論是否參與另一場世界大戰，又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Taft)嘲笑美國完全安全不受攻擊，卻有人主張「加入世界陣營，像個游俠騎士般捍衛民主和真誠理念，展現得像唐吉訶德一樣，站在法西斯主義的對立面。」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反駁認為，即便美國不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威脅之下，若這些強大的獨裁政權最終主宰其所在地區，世界將變得「危險至極且殘破不堪」。小羅斯福相信，獨裁政權終將聯合起來並對僅存的民主



在數個世紀前對國際事務長期漠不關心的美國，現今已赫然成為全球權力平衡者。(Source: USN/ Paul Archer)

根據地發動最後一擊，在此刻來臨前，美國可能成為獨裁世界裡的民主「孤島」，民主制度本身亦將日漸式微。但反對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士不僅擔心介入後付出的成本，對取得勝利後的結果亦倍感憂心。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國家臣服於歐洲帝國的利益之下，亦不希望取代這些帝國成為世界

主導力量。如同美國政治家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所示警，他們擔心一旦成為「世界的主宰者」(Dictatress of the world)，美國將失去自己的靈魂。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此辯論暫停，但爭議仍未見終止。小羅斯福以重建戰後秩序為出發點參與戰爭，但多數美國人卻僅

視這場戰爭為自我防衛，完全仍以安居大陸的觀點看待之。他們期待戰爭結束後可以回到老家。

因此，當二戰結束後美國稱霸世界，美國人隨之陷入認知分歧。冷戰期間，他們在全球扛起前所未有的責任，在遙遠的戰場部署數百萬軍隊，在朝鮮和越南打了兩場戰役，其人員



傷亡所付出的代價遠超過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15倍。美國人推廣自由國際貿易制度，讓其他國家繁榮受益的程度遠高於自己。他們在世界各個角落介入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事務。不論有意或無意，他們亦建立了自由世界秩序，打造出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讓全球得以欣欣向榮，且史無前例地擴大民主國家的涵蓋範圍。

這是小羅斯福在二戰期間以及繼任者杜魯門所有意推動的目標。他們相信以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將是1930年代無政府狀態的唯一解藥。要讓這個世界秩序成形，如同在杜魯門總統之下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所言，美國不能「只是配槍坐在客廳乾等。」美國必須走向世界積極打造，在嚇阻某些強權的同時對其他強權伸出援手；必須在關鍵地點「展現力量」(situations of strength)，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核心工業發展地區維持穩定繁榮、擴大民主政體。艾奇遜指出，美國必須擔任「人類的火車頭」引領全世界的腳步。

美國政策未定

然而，即便他們打造了這樣的世界秩序，多數美國人對世界秩序之目標仍一知半解。大多情況下，是共產主義這個威脅合理化額外行動，讓成立北約和防衛日本、韓國、越南之作為顯得正當。在共產主義被視為威脅美國生活方式的情況下，打擊共產主義幾乎成為國家利益的代名詞。當美國在1947年對於是否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猶豫不決時，共和黨參議員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建議杜魯門政府官員「把美國人嚇得屁滾尿流。」

而艾奇遜也採用了這個推展工作的權宜之計，如同在他的回憶錄所述：「清楚宣傳重於事實呈現。」在共產主義成為頭號敵人下，什麼事都好辦。任何一個動作都是在保護自身安全。

因此，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人出於自我認知，開始對當時自身實際承擔的角色有所質疑。沒有了共產主義這個全球性威脅，美國人開始質疑其外交政策目標為何。建立環顧全球(Global-girdling)的安全體系、獨霸全球的海軍，與遠在天邊的數十個國家締結聯盟，打造自由國際貿易制度的意義似乎不明。

許多人士開始提出反對意見。1990年，當伊拉克獨裁者海珊入侵科威特，老布希總統以維持世界秩序為由出兵。老布希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發表電視演說，引用美國出征伊拉克的陸戰隊指揮官的話指出，「殘虐無道加上目無法紀，便可以橫行無阻，這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世界。」但當現實主義者和保守派人士批評老布希眼中的「新世界秩序」野心太大且過於理想化時，執政當局轉而朝著美國人狹隘的安居大陸心態試圖說服，時任國務卿的貝克(James Baker)以「工作、就業、保障」說明發動波灣戰爭是為了保住美國人的飯碗。後來柯林頓總統兩次介入巴爾幹半島衝突並且擴大北約，是為了捍衛世界秩序，同時杜絕歐洲種族清洗，進而延續老布希總統「促進歐洲完整自由」(a Europe whole and free)之政策方針。但同樣的，柯林頓亦因為涉入「國際社會事務」而遭到現實主義者批評。

緊接著，小布希總統亦面臨同樣問題。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旨在維護世界秩序，幫助中東和

波斯灣，在侵略者接二連三出現，卻把自己包裝成薩拉丁(Saladin)再世的情況下擺脫陰影。但911恐怖攻擊事件，卻導致世界秩序維護這個目標和國土防衛混為一談，使後者成為發動戰爭的主要訴求。當海珊的武器計畫被證明為假情資後，許多美國人認為伊拉克對美國造成直接威脅的說法根本是天大的謊言。歐巴馬總統在此幻想破滅、至今仍影響美國人態度的怒火下登上權力大位。諷刺的是，當歐巴馬拿到諾貝爾和平獎時，他認為願意對「全球安全背書」的美國人是造就戰後世界穩定的推手，且這源於美國「開明的追求自我利益」。然而，事後不證自明，美國人對建設自己的家園更感興趣。就像塔夫特，歐巴馬的現實主義開始「世界就是如此」(The world as it is)，而不追求世界秩序該有的樣貌。

1990年，美國聯合國前大使柯派翠克(Jeane Kirkpatrick)主張，美國應回歸為僅有正常利益的「普通」國家，放棄超級大國狀態下模稜兩可的利益，替「不自然的」外交政策劃下句點，以「傳統觀點」追求國家利益。這意味美國必須保護人民、國土、財富，以及取得「必要」物資的管道。這個國家無須維持歐洲和亞洲的權力平衡、推廣民主制度，或在不曾直接波及美國人的國際問題上承擔責任。這個安居大陸的觀念仍延續至今。如此主張並不否認美國擁有利益，而是認為國家所擁有的利益如同其他一般國家。

但問題在於，長達一世紀以來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普通」國家，亦不再僅有正常利益。美國的特殊力量使之必須承擔特殊角色。畢竟，如孟加拉人和玻利維亞人亦受益於全球穩定，若另一個德

國出現主宰歐洲或是另一個日本出現主宰亞洲，他們將深受其害。但是，沒人會認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係屬其國家利益，因為他們就缺乏如此能力，就像在1798年時，美國亦缺乏能力應對歐洲霸權的野心威脅。當舊世界秩序於20世紀早期瓦解，世界秩序開始成為美國關切的焦點，也只有這個國家有能力建立一個足以保護其國家利益的新世界秩序。

直至今日，安居大陸仍是主流看法，情況更甚於柯派翠克時代。這是美國人談論外交政策的語言，同時是他們理解國家利益和安全概念的理論典範，仍然瀰漫著道德觀念。許多人士不加思索地引用開國元勳的智慧要求對外「節制」，聲稱若背棄這些原則，就是自以為救世主的傲慢行為，且帶有帝國主義的味道。他們始終認為不受拘束的美國權力，將阻礙世界朝向更美好正義的方向發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後續混亂局面，不僅是判斷和執行方向錯誤造成的結果，亦是美國的靈魂汙點。

美國人仍渴望回到過去與世無爭的單純年代。甚至在內心深處，他們希望權力稍微弱化。現實主義者長期認為，只要美國維持強大，它就難以抗拒政治學者塔克(Robert Tucker)和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所稱的「帝國主義誘惑」。這亦是為何現實主義者總是堅稱美國權力在走下坡，或是無法承擔重任。專欄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在1940年代晚期便如此認為，就像1960年代晚期季辛吉(Kissinger)和1980年代的甘迺迪(Paul Kennedy)，許多現實主義者至今仍作如是觀。從越戰到伊



拉克戰爭，現實主義者把每一個差強人意的戰爭都視同為西西里遠征，就像導致雅典在西元前五世紀在斯巴達戰敗的愚蠢行為。亦因此整個世代的美國人認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並未取得明確勝利，證明了國家已無法再運用權力完成任何事情。中共崛起、美國的全球經濟份額下滑、新軍事科技被超前以及世界權力結構擴散，都再次顯示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已步入黃昏。

然而，如果美國像許多人所說的如此不堪，就根本沒有需要對外節制的問題。背後更精確的原因，在於這個國家仍有能力執行一套維持世界秩序的策略，讓批評者須從中阻攔。事實上，國際權力結構未如想像般改變如此之大。地球還是圓的；美國仍座落在廣大、對外隔絕的大陸，被海洋和力量較為薄弱的國家環繞；其他大國仍處於強敵環伺的區域；當其他地區的某個國家變得過於強大，使其他國家必須加以抗衡，因而蒙害的國家仍希望美國伸出援手。

儘管俄羅斯擁有為數眾多的核子武器，卻仍是「擁有飛彈的上伏塔共和國」(Upper Volta with rockets)，但這段俏皮話當時出現在冷戰初期，蘇聯至少還掌控半個歐洲。中共已取代日本，財富和人口數量更為龐大，但軍事能力未經考驗，戰略位置亦較為不利。當日本帝國於1930年代擴張時，並未面臨令人望而生畏的競爭者，西方國家亦籠罩於德國威脅之下。目前亞洲充滿其他大國，包括全球軍力排名前十名的國家，即印度、日本以及南韓，他們都是美國的盟邦或夥伴國。若北京相信華府的權力弱化，企圖運用崛起的權力改變東亞戰略態勢，則會同時遭遇美國勢力及全

球先進工業國家聯合對抗，就像蘇聯當時碰到的情況一樣。

川普時期已對美國的世界秩序進行壓力測試，而此秩序顯然通過考驗。當面臨流氓般的超級大國撕毀貿易和其他協議，美國盟邦總是姑息和哄騙因應，這根本是提油救火，還痴等苦盡甘來。競爭對手亦因而得寸進尺。當川普下令狙殺伊朗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可以預期伊朗不會放棄報復以對，也不會在川普卸任後，怒氣便煙消雲散。中共受長期關稅戰衝擊，使其付出比美國更多代價，但他們仍希望避免所仰賴的經濟關係完全瓦解。歐巴馬曾擔心提供攻擊性武器給烏克蘭可能會與俄羅斯爆發戰爭，但當川普政府輸出武器，莫斯科也只能碎念幾句然後加以默認。川普的政策古怪而不討喜，但這卻顯示美國仍有大量未使用的權力可供美國總統運用。在歐巴馬時期，政府官員總是反覆推敲50次才訴諸政策執行，永遠擔心其他國家可能升高衝突。但川普時期，反而是其他國家擔心可能哪裡得罪了美國。

權力越大，責任越大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1930年代早期曾感嘆道，美國「僅懶惰地運用其無可限量權力的一小部分」。當時，美國國防支出占GDP的2%至3%。目前則小幅超過3%。在1950年代艾森豪政府時期(因節制美國外交政策受到多方推崇)，當時美國擁有1億7,000萬人口，海外駐軍達100萬人。但回到今日這個被說成美國過度危險擴張的時代，卻在擁有3億3,000萬人口情況下，只有20萬海外駐軍。必須承認，美國目前處於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政策並不討喜，造成盟邦許多壓力，也顯示了美國仍有許多權力可待總統揮灑。(Source: AP/達志)

和平模式，因此不構成「懶惰地運用一小部分」美國權力。但若美國走向戰爭，甚至是冷戰般的情況，在應對諸如中共犯臺行動時，則會顯得美國不合時宜。

在冷戰末期對抗高峰的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時期，美國國防支出達到GDP的6%，且軍事工業產製的武器不論質量或數量都遙遙領先蘇聯。中共亦可能發現他們處於相同困境中。如同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將於二戰時形容自身軍力說道，他們「可能在前六個月或一年可以順利進攻。」但他警告，當時間拉長，對抗怒

火中燒的美國及其盟邦，他們的下場將和美國其他對手一樣。

美國與中共和其他挑戰國家進行全球冷戰或熱戰對抗能否取得優勢，這已不是問題重點。毫無疑問他將更勝一籌。真正問題在於美國能否避免他國對其恨之入骨，鼓勵中共和其他國家和平追求目標，將全球對抗侷限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使他們和世界因此免於大戰再次爆發的災難，或是躲過另一場肅殺的冷戰對抗。

美國若持續堅持其19世紀的國家利益觀點，便將無法阻止這些危機發生。這麼做亦只會讓舊事



美國如欲維持自由主義，主動出擊是唯一可行方式；也只有美國足以支撐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Source: US Army/ Robert Fellingham)

一再重演：亦即先是漠不關心或緊縮涉外行動一段時期，接著才驚慌失措地緊急動員介入。美國不斷遭受兩個力道拉扯。一方面，中共目前已取代美國人心中過去德國和蘇聯占有的位置：中共是足以直接打擊美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對手，在關鍵地區或世界各地，其亦有能力和野心威脅美國地位。另一方面，許多美國人認為國家正走下坡，而中共終將主導亞洲。毫無疑問，美、「中」的自我認知相當類似。中共認為，美國過去在東亞地區扮演的角色過於牽強而無法持久，而美國亦作如是想。中共認為美國國力在走下坡，許多美國人亦抱持同樣看法。目前危險之處在於，若中共逐步

擴大力道實現它所謂的「中國夢」，美國將開始驚慌失措。這樣的錯誤評估現在可能隨時發生。

或許中共會小心翼翼地以歷史為鑑，不會犯下他國誤判美國的錯誤。但美國是否已從歷史中學到教訓，恐怕還有待觀察。畢竟其涉外態度已擺盪長達一世紀之久，難以改變。特別是因為外交政策專家和各界輿論都認為，支持自由世界秩序是不可能且不道德的行為。他們的看法存在許多問題，甚至毫無根據地樂觀認為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可被取代。許多現實主義者、自由國際主義者、保守民族主義人士，以及左派人士似乎都幻想認為，即便沒有華府過去75年來所扮演的角

色，世界依舊會安然無恙，美國利益亦仍會妥善受到保護。但不論從近代歷史或當前環境來看，這些理想主義都站不住腳。美國的世界秩序被取代，瑞典式世界秩序不會因此出現。這不會是個遵守法紀和國際制度的世界，也不會是啟蒙時代理性思維的勝利或是歷史的終結。這將是一個權力真空、災難頻仍、戰火瀰漫和充滿誤判的世界，最終也將變得殘破不堪。

讓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是，要在國內和海外維持自由主義，主動出擊是唯一的可行方式，且美國是唯一足以支撐這個秩序的國家。這不是狂妄傲慢的說法，而是考量國際環境的現實狀態。對美國而言，這是好壞參半之事。為了維持這個秩序，美國過去和未來都須動用權力，有時甚至是在所費不貲、道德結果晦暗不明情況下笨拙地進行。但這就是動用權力的本質。美國人一直希望能卸下這個負擔、擺脫這個責任，有時背對夢想般的國際主義，有時決定對世界放手不管，且總是認為在沒有明確威脅之下，他們可以



拜登總統與團隊應致力向民眾傳達，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仍至關重要。

(Source: The White House/ Cameron Smith)

躲在家園裡相安無事。

現在是時候大聲疾呼，告訴美國人他們確有無可迴避的全球責任，必須跳脫保護家園的思維。人們必須瞭解北約和其他同盟組織不只是對抗對美國利益造成的直接威脅，而是讓符合美國最高利益的全球秩序免於瓦解。人們必須被誠實告知，維持世界秩序任重道遠，須付出代價但沒有其他選擇。未能和美國人民溝通取得共識，而使這個國家面臨困境，讓社會大眾感到疑惑與憤怒，認為其領導人為了邪惡的「全球主義」目標背棄美國利益。目前唯

一的解決方式，不是搬出中共和其他威脅把人們嚇得屁滾尿流，而是回過頭來嘗試和民眾解釋，美國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仍至關重要。這會是拜登和新政府團隊的重要工作。

作者簡介

Robert Kagan 為布魯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著有《叢林重新崛起：美國與我們危在旦夕的世界》(*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Copyright © 202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